

<<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13位ISBN编号：9787807207665

10位ISBN编号：7807207663

出版时间：2007.08

出版时间：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作者：张朋园

页数：32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 内容概要

本书以“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为题，拟探讨立宪运动对革命之影响及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所涉范围有下述各点：一、从事立宪运动的知识分子，何以态度温和，或与其出身背景有关；了解立宪派的出身背景，而后可以了解其温和态度之由来。

二、立宪派人士既以立宪政治为理想，此一观念得自何人之倡导，并用什么方法去求其实现？

三、在从事于实际活动中，立宪派的遭遇如何？

此一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如何？

四、立宪运动是一个失败的运动，何以失败？

是立宪派自身组织的不健全，抑或是统治者的反对阻挠，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五、立宪派人士失望之余，心理上的变异如何？

是否转向同情革命？

六、辛亥革命发生之后，立宪派人士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他们是积极赞助还是消极卷入，或别有利用革命的企图？

本书探讨立宪运动对革命之影响及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

著者用政党原理去分析立宪派的背景、信仰、组织，用群众运动的眼光去剖视他们的群众基础和活动的方法，及其所发生的影响，用群众心理推测他们的心理变异。

对于他们卷入革命之后的活动，则以个案研究方式，探讨他们对革命反应的类型。

## <<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 作者简介

张朋园，生于1926年。

海内外知名学者，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任、所长等职。

著有《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等。

## <<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 书籍目录

韦慕庭先生序 自序 三版序 上编 立宪派与立宪运动 第一章 立宪派与清廷预备立宪 一、清廷预备立宪 二、立宪派的兴起 第二章 谘议局的建立与立宪派的结合 一、谘议局的选举 二、立宪派人的背景与结合 第三章 立宪派的言论与宣传 一、立宪言论的指导者梁启超 二、立宪派的言论机关 第四章 请愿国会与弹劾军机 一、谘议局与请愿国会 二、资政院与弹劾军机 第五章 革命前夕立宪派的态度 一、立宪派态度的转变 二、宪友会的动向下编 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第六章 川鄂湘与武昌革命 一、蒲殿俊与川路风潮 二、汤化龙与武昌起义 三、谭延闿与湖南独立 第七章 两广闽浙晋鲁诸省之独立 一、两广谘议局之响应独立 二、立宪派在闽浙与革命党的合作 三、晋鲁立宪派对独立的态度 第八章 云贵皖赣之独立 一、云南独立及贵州派系之争 二、皖赣立宪派的活动 第九章 华北东北及西北各省的企图 一、直豫立宪派对革命的态度 二、东北保安会的特质 三、陕甘立宪派人的消极与反动 第十章 江苏立宪派与革命大局 一、张謇拥护袁世凯的计划 二、张謇与革命党的合离结论 附录一 各省谘议局议员名录 附录二 资政院议员名录 参考书目

## &lt;&lt;立宪派与辛亥革命&gt;&gt;

## 章节摘录

结论 清季国势阽危，激起了革命与立宪两大运动。就其结果而论，革命党是成功者，清朝被推翻了；立宪派是失败者，不仅理想未能实现，连所拥戴的偶像也消失了。

立宪派是一群笃信君主宪政救国论者的结合，他们大多是受过传统教育的绅士，以儒家的思想为正宗。

但是其中亦有曾经留学日本，或进过新式学堂的，或多或少具备了一些时代的知识与观念。他们大多家道殷富，是社会的中坚势力。

他们的年龄，平均在四十岁上下，正是有为之时。

他们认为君主立宪是当前救国之道，受政论家梁启超的启发，更使他们笃信立宪是可以实行，势在必行的。

他们要求早日召开国会，实现君民共治的理想。

不幸他们再三受到挫折，心理为之大变，转而同情革命，辛亥武昌起义之后，他们的行动举足轻重。

立宪派人既受儒家传统观念与西方新知的影响，而这两种思想，有时互相冲突，有时相辅相成，颇能产生某些一定的作用。

例如忠君观念，千余年来，根深蒂固，士绅是朝代政权的拥护者，甚少有人作“离经叛道”之想，延至清末，亦不例外。

但是新知识使他们感到国家势处危亡，看出了传统政治的不足以有为，必须求变。

传统思想是保守的，新知识是进取的，彼此有难以融合之处。

士绅是统治阶层的继起者，随时希望进入政府。

当他们获得一些新知之后，常常据以批评掌权者的无能，主要目的即在早日接掌政权。

换言之，士绅是争权的，新知扩大了他们的权力观念，进而积极争取，这是新知与传统观念相辅相成之处。

立宪便是传统观念与新知结合的权力运动。

由此可知，立宪运动是士绅阶层本身的运动。

他们的口号是争民权，但不一定是真正为全国人民而争。

这种狭隘的权力运动，比之西方人争大众的幸福(happiness)的运动，相去颇远。

然而有一点必须注意的，即士绅所信奉的儒家思想，教导他们爱护袍泽，推己及人。

如果此一运动继续发展，何尝没有演变成为全民政治的可能。

不过在向统治者争取权力的初期，他们自身的利益在先，人民的利益在后，尤其士绅大都家道殷富，他们倡言“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不无为自身利益打算的念头。

请愿国会，是士绅向统治者要求权力的运动。

而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似乎并不把士绅放在眼中，以士绅的地位多得之于统治者，他们必须在现状下始能保有其地位。

但士绅既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并非如统治者所想象的驯顺，于是双方便不免发生冲突。

立宪派揭露统治者的腐败，指责旧秩序的不合理，统治者无以自解，不得不稍作让步。

但是有限度的让步，并不能满足一个正在发展中的运动。

立宪派人一再制造口实，猛烈攻击，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最为凌厉，清政权的解体，此为导因之一。

社会学家密尔士(C. Wright Mills)说：一种新知识的不断滋长，一种新时代观念的广为传播，往往使统治者的措施愈来愈为错乱，愈为把持不定。

立宪派要求国会，步步进逼，清廷时而退让，时而严拒，手忙脚乱，六神无主，正是如此。

又如托克威耶(Alexis de Tocquville)所说：在集权的国家，绝不容许异端运动的产生，如果集权者稍一松手，集权政治便有瓦解的危机。

立宪运动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是很显然的。

但是，立宪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运动。

西方的人权运动，经过漫长的岁月始渐次实现，中国要想在短短数年之间，将西方制度移植过来，是

## <<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不可能的。

立宪派本身的缺点甚多：第一，他们未能激起全国人民的响应，甚而不能得到整个士绅阶层的支持。他们争国会，说内忧外患严重，只有国会才能救亡。

国会何以能救亡？

在当时能够明白其中道理的，限于知识阶层而已。

一个运动既不能全面激起一般群众的热情，其基础是薄弱的。

第二，立宪派人虽然强调反对专制，却不能摆脱传统。

他们希望多得权力，又怕失去了既有的地位。

他们实未能了解“为理想而奋斗者常胜，不能脱离现实者常败”的群众运动原理。

有舒适的生活环境者，难于为一种神圣的使命而力拼。

第三，他们缺少一个真正的领袖。

立宪派中似乎人人皆可为领袖，似乎又无人有完全领导的资格。

一个杰出领袖应具备的条件是：勇敢、反权力、铁一般的意志、热情、信仰坚定、相信个人的命运由自己决定、知人善任、得众人的信服。

梁启超只是理论家。

孙洪伊只有一方面的才具。

张謇只能得一部分人的信仰。

换言之，立宪派人只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家；只有理论，而不能灵活运用。

虽然立宪运动注定要失败，但对辛亥革命仍有所影响。

革命的成败，时势的关系至大。

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有布尔什维克、法西斯及纳粹的出现，否则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是不是会成为一世之雄，颇不易言。

革命家在现代革命中固然占据显赫而重要的地位，但这种显赫与重要，并不包括革命的准备。

1848年的欧洲大革命，不待胜利者进攻，专制君王已先倒了下去。

胜利者惊讶他们的胜利得来何其容易，更惊讶其对手不堪一击。

辛亥革命何尝不是如此，推翻清廷不过是百余日之间的事。

如果不能发现革命的时势已成，如何给予解释？

所谓时势，除了统治者自身的腐化外，舆论是最大的制造力量。

只有舆论才能揭露统治者的斑斑劣迹。

有人说，革命发生之前梁启超是革命党的“宣传部长”，是革命党的代言人。

如若这非过甚之词，谏议局成立后，革命党也就多了无数的宣传者与代言人。

自来革命活动，有计划的(planning)与无意识的(spontaneity)两种。

立宪派人指责清廷，要求国会，他们有意要求立宪，却无意之间刺激了革命。

一般群众基本态度是保守的，他们不敢接受遽然的变动。

因此他们对于激烈革命家的鼓吹与煽动，带着恐惧与怀疑的心理，往往视革命家为危险人物，甚至斥为叛逆，咒骂他们是不切实际的狂徒，很少会听信他们的宣传。

Eric Hoffer, *The True Believer*, pp. 119-120. 列宁尝发觉他初期的革命不能接近群众，孙中山早年革命的处境何尝不如此。

革命党的报刊被列为禁物，不能公开传布。

只有立宪派的言论，据有合法的地位，四处流布，其措词温和，其影响却深远。

立宪派人说了些什么有利于革命的话？

最简单而扼要的，莫过于指责清廷的政治和财政败坏，无意改革。

立宪派人要求国会和责任内阁，使清廷进退失据，而抨击其财政紊乱，更揭露了政府的鱼烂实情。

西方的几次大革命，无不因赋税而引发。

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 I)登基之后(1624)，为了征税问题而与下院水火，引发了权利请愿，自此权力受到限制。

美国的革命可以说始于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

## &lt;&lt;立宪派与辛亥革命&gt;&gt;

法国路易十六召集贵族会议及三级会议，亦是为了征税问题与人民争执而引发了革命。

清廷的财政困难，有过之而无不及。

立宪派人指责清廷借债度日，官员贪污，政府的威信为之扫地，大大地影响人心的向背。

参加革命者，并不一定要躬冒矢石。

革命的危机时期，理想主义者出而鼓吹，鼓吹的方式不一，有的由于宣示他的理想而促成了革命的直接爆发，有的虽不直接鼓吹，却间接促成了革命。

两者固有轻重的不同，但在革命运动中皆属不可或缺。

孙中山一派是革命的直接鼓吹者，梁启超指导下的立宪派是革命的间接助长者。

梁启超痛恨革命，视革命如毒药。

但他也承认毒药固可以致人于死，同时亦可治病。

清廷病入膏肓，一剂毒药，国家或可得救于万一。

此类言论，虽不革命，等同革命。

再者，一个运动的性质很难加以限定。

运动的表面看似单纯，实际却包含着种种不同的因素。

希伯来人出埃及，可以说是奴隶的暴动，也可以说是宗教的、民族的运动。

日本的军国主义也带着宗教的意味。

立宪运动是和平的改革运动，但它的发展，又具有革命的特性，因为立宪派人持论与政府相对立，于不知不觉的演变中倾向同情革命，有利革命。

赵凤昌尝说：“清室以立宪诳国民，国民亦以立宪诳清室，所求在此，所得在彼。”

赵凤昌，“惜阴堂笔记”，《人文月刊》，卷2期8（1931年10月）。

结果立宪运动为之变质。

立宪派最后卷入了革命。

由于失望于清廷，他们放弃了拥护帝制的初衷。

此一改变，关系着革命爆发的迟速，因为政治的稳定与否，常视上层社会的心理状态而定。

有社会地位者，不像布衣粗食者，永远沉默于他人的统治之下。

不反抗则已，一旦持反对立场，往往牵动全局。

他们所感到的不满，并非物质的而是心理的。

从心底发出的反抗，最能动摇整个旧社会的秩序。

革命发生后，首当其冲的是地方。

各省谘议局是地方上的民意机构，议员如果不以官方的意志为意志，可能便是敌对的。

他们是地方上的间接领导者，平时推进建设，乱时出而维持秩序。

武昌起义后，由于他们心理上的变异，大多站在革命一边。

立宪派之赞助革命，固然出于失望清廷的心理，同时也想藉此表示前进。

过去他们常常被指责为拥护传统的反革命者。

他们虽不承认此种似是而非的批评，在潜意识中多少是有所歉疚的。

蒲殿俊、汤化龙、谭延闿等之卷入革命漩涡中，便是很好的例子。

如果不是以往革命与立宪间的鸿沟，谁能说他们不是革命的？

张一麐说：“辛亥革命，皆以谘议局为发端。”

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卷8，页38。

指出了立宪派人之主动响应革命。

立宪派人卷入了革命，与革命党曾经有过妥协，由妥协而携手。

但是除了数省始终如一的合作外，其余为时甚为短暂，有的不过十天半月，最长的也不过三数月而已。

这种短暂的合作，与所谓的“革命的弥月时期”颇相吻合。

革命弥月时期的意义是，当革命发生后，专制政权被推翻了，革命成功的气氛出现了，但是实际上这只是激烈斗争时期的过去，昙花一现的平静现象而已。

在这时出而掌握政权的，大多数是有声望而较为温和的人。

## <<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他们掌握政权之后，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层出不穷的难题。他们要改革旧制度，要建立新制度，还要推行日常的政务。现实使他们不可能再采取激烈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如果他过去是激烈的，必然转趋温和。

如果他本来是温和的，显得更为稳健。

但是温和与稳健，必定使激烈的不在位者为之不满。

不满发生了，必定再有激烈的行动出现，将掌权者推倒。

第二次的激烈行为，往往产生恐怖和屠杀。

四川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蒲殿俊等取得政权后，一时不能稳定局面，激烈者掀起浪潮，将他们从政治舞台上赶了下来。

湖北汤化龙的处境更为典型。

武昌起义，汤在各方面的运用与措置，有目共睹。

但是他原本属于稳健者，被迫下台之后，与激烈的革命党公开分裂。

这种分裂，是革命情势发展中无法避免的。

立宪派与革命党由合作而分裂，为必然的结果。

任何革命在局势稳定之后，得势者往往以成功者自居。

新得权力者，多以新贵的姿态出现。

革命党与立宪派交恶已久，前者自不容许后者控制新的局面。

立宪派多属士绅阶层，本其传统的权力观念，又焉肯轻易让步？

几经周折，他们认为革命党难与共图大业，只有另寻在他们眼中有克瑞仕穆(charisma)的领导者袁世凯了。

张謇的江浙派，且根本无意拥护孙中山，他们早已倾向于袁世凯。

所以无论是革命党排斥立宪派，或立宪派轻视革命党，都是分裂的原因。

事关双方利害者小，而影响民国的政局则十分深远。

辛亥革命是不是一个成功的革命呢？

单就推翻清朝政权，结束了数千年的专制政体而论，似乎可以说是成功的。

但是革命之后的大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全民政治的政府，如何从事建设，如何改良社会。

一言以蔽之，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这些虽然有人想到了，却未能立刻付诸实行。

因此，又可说这是一个不彻底的革命。

革命何以不彻底？

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之一，恐怕就是立宪派人卷进革命之后，使此一运动不能勇往直前；该破坏的未能破坏，该建设的未能建设。

就各省迅速宣布独立使清廷覆亡方面来看，立宪派自有其贡献。

但是他们的保守终成了革命的一大障碍。

北京紫禁城中仍然住着一位“皇帝”，此出于立宪派的安排。

以旧官僚袁世凯为民国元首，亦为他们左右的结果。

凡此皆象征着旧传统的延续，新制度的难以建立。

立宪派人的保守性大，妥协性亦大。

与激进者，他们妥协，对守旧者，他们也妥协。

因为他们一心拥护袁世凯，不得不多方面对袁迁就，于是革命不得不中道而止。

拥出袁世凯之后，他们参加了统治阶层，使革命的气氛消失得更快，因而种下了日后的乱因。

这与法国的革命一样。

法国人见美国革命的容易，却不见本身根深蒂固的传统，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革命，恐怖、残杀层出不穷。

辛亥革命以后多少走了同一的道路。

指责立宪派阻挠革命的人很多，但未能指出他们的阻挠是什么？



## &lt;&lt;立宪派与辛亥革命&gt;&gt;

辛亥革命以后，社会与政治不能得到改革，不能及时走向现代化，这才是他们的罪责，虽然只是一部分罪责。

不过有一点必须强调的，辛亥时期中国国际环境的险恶，有目共睹。

帝国主义者处心积虑地要瓜分中国，只有知识分子看得最为真切。

他们早已指出，动乱将予人可乘之机。

而今革命发生了，他们已无法防止，所盼望的，是动乱不要扩大蔓延。

他们在各省独立中的力图控制局势，虽是权力之争，亦是出于救时之心。

革命没有变成混乱，避免了无谓的流血。

他们力挽狂澜之功，是不能否认的。

如果民清双方相持不下，南与北之间，省与省之间，派与派之间，攻战不停，中国又将会成了什么局面？

保守的立宪派的影响力就在于此。

惟中国未能及时彻底改革，他们又何尝没有责任？

结论 结论 清季国势阽危，激起了革命与立宪两大运动。

就其结果而论，革命党是成功者，清朝被推翻了；立宪派是失败者，不仅理想未能实现，连所拥戴的偶像也消失了。

立宪派是一群笃信君主宪政救国论者的结合，他们大多是受过传统教育的绅士，以儒家的思想为正宗。

但是其中亦有曾经留学日本，或进过新式学堂的，或多或少具备了一些时代的知识与观念。

他们大多家道殷富，是社会的中坚势力。

他们的年龄，平均在四十岁上下，正是有为之时。

他们认为君主立宪是当前救国之道，受政论家梁启超的启发，更使他们笃信立宪是可以实行，势在必行的。

他们要求早日召开国会，实现君民共治的理想。

不幸他们再三受到挫折，心理为之大变，转而同情革命，辛亥武昌起义之后，他们的行动举足轻重。

立宪派人既受儒家传统观念与西方新知的影响，而这两种思想，有时互相冲突，有时相辅相成，颇能产生某些一定的作用。

例如忠君观念，千余年来，根深蒂固，士绅是朝代政权的拥护者，甚少有人作“离经叛道”之想，延至清末，亦不例外。

但是新知识使他们感到国家势处危亡，看出了传统政治的不足以有为，必须求变。

传统思想是保守的，新知识是进取的，彼此有难以融合之处。

士绅是统治阶层的继起者，随时希望进入政府。

当他们获得一些新知之后，常常据以批评掌权者的无能，主要目的即在早日接掌政权。

换言之，士绅是争权的，新知扩大了他们的权力观念，进而积极争取，这是新知与传统观念相辅相成之处。

立宪便是传统观念与新知结合的权力运动。

由此可知，立宪运动是士绅阶层本身的运动。

他们的口号是争民权，但不一定是真正为全国人民而争。

这种狭隘的权力运动，比之西方人争大众的幸福(happiness)的运动，相去颇远。

然而有一点必须注意的，即士绅所信奉的儒家思想，教导他们爱护袍泽，推己及人。

如果此一运动继续发展，何尝没有演变成为全民政治的可能。

不过在向统治者争取权力的初期，他们自身的利益在先，人民的利益在后，尤其士绅大都家道殷富，他们倡言“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不无为自身利益打算的念头。

请愿国会，是士绅向统治者要求权力的运动。

而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似乎并不把士绅放在眼中，以士绅的地位多得之于统治者，他们必须在现状下始能保有其地位。

但士绅既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并非如统治者所想象的驯顺，于是双方便不免发生冲突。

## &lt;&lt;立宪派与辛亥革命&gt;&gt;

立宪派揭露统治者的腐败，指责旧秩序的不合理，统治者无以自解，不得不稍作让步。

但是有限度的让步，并不能满足一个正在发展中的运动。

立宪派人一再制造口实，猛烈攻击，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最为凌厉，清政权的解体，此为导因之一。社会学家密尔士(C. Wright Mills)说：一种新知识的不断滋长，一种新时代观念的广为传播，往往使统治者的措施愈来愈为错乱，愈为把持不定。

立宪派要求国会，步步进逼，清廷时而退让，时而严拒，手忙脚乱，六神无主，正是如此。

又如托克威耶(Alexis de Tocquville)所说：在集权的国家，绝不容许异端运动的产生，如果集权者稍一松手，集权政治便有瓦解的危机。

立宪运动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是很显然的。

但是，立宪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运动。

西方的人权运动，经过漫长的岁月始渐次实现，中国要想在短短数年之间，将西方制度移植过来，是不可能的。

立宪派本身的缺点甚多：第一，他们未能激起全国人民的响应，甚而不能得到整个士绅阶层的支持。

他们争国会，说内忧外患严重，只有国会才能救亡。

国会何以能救亡？

在当时能够明白其中道理的，限于知识阶层而已。

一个运动既不能全面激起一般群众的热情，其基础是薄弱的。

第二，立宪派人虽然强调反对专制，却不能摆脱传统。

他们希望多得权力，又怕失去了既有的地位。

他们实未能了解“为理想而奋斗者常胜，不能脱离现实者常败”的群众运动原理。

有舒适的生活环境者，难于为一种神圣的使命而力拼。

第三，他们缺少一个真正的领袖。

立宪派中似乎人人皆可为领袖，似乎又无人有完全领导的资格。

一个杰出领袖应具备的条件是：勇敢、反权力、铁一般的意志、热情、信仰坚定、相信个人的命运由自己决定、知人善任、得众人的信服。

梁启超只是理论家。

孙洪伊只有一方面的才具。

张謇只能得一部分人的信仰。

换言之，立宪派人只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家；只有理论，而不能灵活运用。

虽然立宪运动注定要失败，但对辛亥革命仍有所影响。

革命的成败，时势的关系至大。

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有布尔什维克、法西斯及纳粹的出现，否则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是不是会成为一世之雄，颇不易言。

革命家在现代革命中固然占据显赫而重要的地位，但这种显赫与重要，并不包括革命的准备。

1848年的欧洲大革命，不待胜利者进攻，专制君王已先倒了下去。

胜利者惊讶他们的胜利得来何其容易，更惊讶其对手不堪一击。

辛亥革命何尝不是如此，推翻清廷不过是百余日之间的事。

如果不能发现革命的时势已成，如何给予解释？

所谓时势，除了统治者自身的腐化外，舆论是最大的制造力量。

只有舆论才能揭露统治者的斑斑劣迹。

有人说，革命发生之前梁启超是革命党的“宣传部长”，是革命党的代言人。

如若这非过甚之词，谏议局成立后，革命党也就多了无数的宣传者与代言人。

自来革命活动，有计划的(planning)与无意识的(spontaneity)两种。

立宪派人指责清廷，要求国会，他们有意要求立宪，却无意之间刺激了革命。

一般群众基本态度是保守的，他们不敢接受遽然的变动。

因此他们对于激烈革命家的鼓吹与煽动，带着恐惧与怀疑的心理，往往视革命家为危险人物，甚至斥为叛逆，咒骂他们是不切实际的狂徒，很少会听信他们的宣传。

## <<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Eric Hoffer, *The True Believer*, pp. 119-120. 列宁尝发觉他初期的革命不能接近群众，孙中山早年革命的处境何尝不如此。

革命党的报刊被列为禁物，不能公开传布。

只有立宪派的言论，据有合法的地位，四处流布，其措词温和，其影响却深远。

立宪派人说了些什么有利于革命的话？

最简单而扼要的，莫过于指责清廷的政治和财政败坏，无意改革。

立宪派人要求国会和责任内阁，使清廷进退失据，而抨击其财政紊乱，更揭露了政府的鱼烂实情。

西方的几次大革命，无不因赋税而导发。

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 I)登基之后(1624)，为了征税问题而与下院水火，引发了权利请愿，自此权力受到限制。

美国的革命可以说始于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

法国路易十六召集贵族会议及三级会议，亦是为了征税问题与人民争执而引发了革命。

清廷的财政困难，有过之而无不及。

立宪派人指责清廷借债度日，官员贪污，政府的威信为之扫地，大大地影响人心的向背。

参加革命者，并不一定要躬冒矢石。

革命的危机时期，理想主义者出而鼓吹，鼓吹的方式不一，有的由于宣示他的理想而促成了革命的直接爆发，有的虽不直接鼓吹，却间接促成了革命。

两者固有轻重的不同，但在革命运动中皆属不可或缺。

孙中山一派是革命的直接鼓吹者，梁启超指导下的立宪派是革命的间接助长者。

梁启超痛恨革命，视革命如毒药。

但他也承认毒药固可以致人于死，同时亦可治病。

清廷病入膏肓，一剂毒药，国家或可得救于万一。

此类言论，虽不革命，等同革命。

再者，一个运动的性质很难加以限定。

运动的表面看似单纯，实际却包含着种种不同的因素。

希伯来人出埃及，可以说是奴隶的暴动，也可以说是宗教的、民族的运动。

日本的军国主义也带着宗教的意味。

立宪运动是和平的改革运动，但它的发展，又具有革命的特性，因为立宪派人持论与政府相对立，于不知不觉的演变中倾向同情革命，有利革命。

赵凤昌尝说：“清室以立宪诳国民，国民亦以立宪诳清室，所求在此，所得在彼。”

赵凤昌，“惜阴堂笔记”，《人文月刊》，卷2期8（1931年10月）。

结果立宪运动为之变质。

立宪派最后卷入了革命。

由于失望于清廷，他们放弃了拥护帝制的初衷。

此一改变，关系着革命爆发的迟速，因为政治的稳定与否，常视上层社会的心理状态而定。

有社会地位者，不像布衣粗食者，永远沉默于他人的统治之下。

不反抗则已，一旦持反对立场，往往牵动全局。

他们所感到的不满，并非物质的而是心理的。

从心底发出的反抗，最能动摇整个旧社会的秩序。

革命发生后，首当其冲的是地方。

各省谘议局是地方上的民意机构，议员如果不以官方的意志为意志，可能便是敌对的。

他们是地方上的间接领导者，平时推进建设，乱时出而维持秩序。

武昌起义后，由于他们心理上的变异，大多站在革命一边。

立宪派之赞助革命，固然出于失望清廷的心理，同时也想藉此表示前进。

过去他们常常被指责为拥护传统的反革命者。

他们虽不承认此种似是而非的批评，在潜意识中多少是有所歉疚的。

蒲殿俊、汤化龙、谭延闿等之卷入革命漩涡中，便是很好的例子。

## &lt;&lt;立宪派与辛亥革命&gt;&gt;

如果不是以往革命与立宪间的鸿沟，谁能说他们不是革命的？

张一麐说：“辛亥革命，皆以咨议局为发端。

”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卷8，页38。

指出了立宪派人之主动响应革命。

立宪派人卷入了革命，与革命党曾经有过妥协，由妥协而携手。

但是除了数省始终如一的合作外，其余为时甚为短暂，有的不过十天半月，最长的也不过三数月而已。

这种短暂的合作，与所谓的“革命的弥月时期”颇相吻合。

革命弥月时期的意义是，当革命发生后，专制政权被推翻了，革命成功的气氛出现了，但是实际上这只是激烈斗争时期的过去，昙花一现的平静现象而已。

在这时出而掌握政权的，大多数是有声望而较为温和的人。

他们掌握政权之后，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层出不穷的难题。

他们要改革旧制度，要建立新制度，还要推行日常的政务。

现实使他们不可能再采取激烈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如果他过去是激烈的，必然转趋温和。

如果他本来是温和的，显得更为稳健。

但是温和与稳健，必定使激烈的不在位者为之不满。

不满发生了，必定再有激烈的行动出现，将掌权者推倒。

第二次的激烈行为，往往产生恐怖和屠杀。

四川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蒲殿俊等取得政权后，一时不能稳定局面，激烈者掀起浪潮，将他们从政治舞台上赶了下来。

湖北汤化龙的处境更为典型。

武昌起义，汤在各方面的运用与措置，有目共睹。

但是他原本属于稳健者，被迫下台之后，与激烈的革命党公开分裂。

这种分裂，是革命情势发展中无法避免的。

立宪派与革命党由合作而分裂，为必然的结果。

任何革命在局势稳定之后，得势者往往以成功者自居。

新得权力者，多以新贵的姿态出现。

革命党与立宪派交恶已久，前者自不容许后者控制新的局面。

立宪派多属士绅阶层，本其传统的权力观念，又焉肯轻易让步？

几经周折，他们认为革命党难与共图大业，只有另寻在他们眼中有克瑞仕穆(charisma)的领导者袁世凯了。

张謇的江浙派，且根本无意拥护孙中山，他们早已倾向于袁世凯。

所以无论是革命党排斥立宪派，或立宪派轻视革命党，都是分裂的原因。

事关双方利害者小，而影响民国的政局则十分深远。

辛亥革命是不是一个成功的革命呢？

单就推翻清朝政权，结束了数千年的专制政体而论，似乎可以说是成功的。

但是革命之后的大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全民政治的政府，如何从事建设，如何改良社会。

一言以蔽之，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这些虽然有人想到了，却未能立刻付诸实行。

因此，又可说这是一个不彻底的革命。

革命何以不彻底？

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之一，恐怕就是立宪派人卷进革命之后，使此一运动不能勇往直前；该破坏的未能破坏，该建设的未能建设。

就各省迅速宣布独立使清廷覆亡方面来看，立宪派自有其贡献。

但是他们的保守终成了革命的一大障碍。

北京紫禁城中仍然住着一位“皇帝”，此出于立宪派的安排。

## <<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以旧官僚袁世凯为民国元首，亦为他们左右的结果。

凡此皆象征着旧传统的延续，新制度的难以建立。

立宪派人的保守性大，妥协性亦大。

与激进者，他们妥协，对守旧者，他们也妥协。

因为他们一心拥护袁世凯，不得不多方面对袁迁就，于是革命不得不中道而止。

拥出袁世凯之后，他们参加了统治阶层，使革命的气氛消失得更快，因而种下了日后的乱因。

这与法国的革命一样。

法国人见美国革命容易，却不见本身根深蒂固的传统，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革命，恐怖、残杀层出不穷。

辛亥革命以后多少走了同一的道路。

指责立宪派阻挠革命的人很多，但未能指出他们的阻挠是什么？

辛亥革命以后，社会与政治不能得到改革，不能及时走向现代化，这才是他们的罪责，虽然只是一部分罪责。

不过有一点必须强调的，辛亥时期中国国际环境的险恶，有目共睹。

帝国主义者处心积虑地要瓜分中国，只有知识分子看得最为真切。

他们早已指出，动乱将予人可乘之机。

而今革命发生了，他们已无法防止，所盼望的，是动乱不要扩大蔓延。

他们在各省独立中的力图控制局势，虽是权力之争，亦是出于救时之心。

革命没有变成混乱，避免了无谓的流血。

他们力挽狂澜之功，是不能否认的。

如果民清双方相持不下，南与北之间，省与省之间，派与派之间，攻战不停，中国又将会成了什么局面？

保守的立宪派的影响力就在于此。

惟中国未能及时彻底改革，他们又何尝没有责任？

<<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